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 如何确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兼与其他五种观点商榷



■ 中共一大遗址

□ 蒋南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从何时开始,这是理论界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第四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是中共“八七会议”召开之时。第五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走上井冈山道路之时。第六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是1930年毛泽东写下《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之时。

上述观点均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认为,确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必须要考虑几个要件。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动力——马克思主义应已经存在于中国;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开始被人们了解、接受并运用;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有实施的主体,这种主体可以是有意识地按马克思主义原理去改变中国

笔者认为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更为妥当。

现实的组织或个人;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施主体的“中国化”行为必须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第五,在中国已有开始能够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或行为;第六,在中国已有开始能够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可能性;第七,在中国已有开始能够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认为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是合适的。

这是因为,第一种观点尽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会产生巨大作用,从而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但忽略了下列问题: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有

实施主体,而这时期的实施主体尚不存在;其次,在中国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到真正开始运用从而实现中国化是一个过程,不能简单认为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中国化了;再次,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人看做中国化的实施主体,而实际上这些实施主体有的是外国传教士,有的是非马克思主义者,这会造成实施主体的主观意识与其客观行为,特别是中国化结果的内在矛盾,而这种矛盾是不合乎中国实际的。

第二种观点我们认为正确的。因为这种定位,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施主体有了明晰的概念,即实施主体由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及个人所代表,而不是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者。且这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传入中国,并已经较为系统和全面地将其基本原理展示在中国人民面前,被人们关注及了解。特别是“十月革命”的影响,已经使一批中国的先进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开始借鉴俄国经验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此外,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尝试,已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思想及组织准备。综观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中国历史,尚未发现任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大事件,因而就不可能以这些事件作为载体,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使这种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得以形成。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主体形成,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行为已经开始;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最早打出了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的旗帜;再次,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党纲就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它具有了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及实践成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当然,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尽管组织还弱小、人员还幼稚,纲领还不成熟,但从另一侧

面表明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第三种观点强调在中共“二大”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较成熟的党纲、党章,这在逻辑上难以成立。因为如果形成了理论成果,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达到某一阶段,而不是一个起点。

第四种观点强调“八七会议”这个时期我党开始摆脱机会主义的束缚,开始独立自主地进行武装斗争,从而表现出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的实践特征,表现出了将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加以运用的状况。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即使“八七会议”真正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特点,但是如果没有这之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及掌握,没有对之前中国具体国情的正确认识,是不可能出现“八七会议”的理论与实践成果的。故而将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仍不妥。

第五种观点强调了井冈山道路的正确性,这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的确,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但不能说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其他组织的正确实践活动就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

第六种观点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定义的规范化、实践和认识的成熟化。这种观点除了前述几种观点在逻辑上的缺陷外,还在于仍然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的统一性。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熟概念,是对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及实践的一种概括及抽象。故不宜将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更为妥当。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新作点评

## 英国新左派思想遗产的当代清点

□ 王晓曼

1956年以后,一些欧美国家陆续爆发新左派运动。这其中思想成就最丰硕的要属英国新左派。以《新左派评论》杂志的控制权在1962年转移到佩里·安德森手中为分界线,英国新左派运动通常被分为两个阶段。在1956—1962年的早期阶段,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们主要致力于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思,并在研究具体的英国问题的过程中,创造出了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具有鲜明英国本土特色的理论形态。而在1962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后期阶段,一批更年轻的新左派思想家脱颖而出。他们致力于引入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以期在英国开创一种更具马克思主义特征的理论传统。就在两代思想家的相互碰撞中,英国新左派运动茁壮成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贫困”面貌,将英国打造为一个堪与德法比肩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输出国。80年代初以后,随着“撒切尔主义”的强势推进,英国新左派作为一种新传统对英国当代思想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开始关注英国新左派。这其中有一个深层次原因是国内学界逐步认识到,自觉追求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是英国新左派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和深远影响的关键所在;对于正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国内理论界而言,英国新左派的经验和教训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然而,由于相关文献匮乏,英国新左派的这种重要性尚未得到人们普遍认识。有鉴于此,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的张亮教授主持编译了《英国新左派思想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一书。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共收录英美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12篇,开篇的《英国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在对既有相关研究进行方法论反思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这个全新视角对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发展历程和思想遗产进行了批判性的再探讨。其他11篇文献则是对10位具有重要影响的英国新左派思想家的个案研究。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收录的个案研究大多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美学界比较经典的成果,基本上体现了国际学界对相关思想家的主流认识或最新研究动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收录的有关理查德·霍加特、拉尔夫·密里本德和汤姆·奈恩的三项研究在国内学界属于首次出现,具有一定的补苴意义。作为伯明翰学派的奠基人之一,理查德·霍加特一向以《文化研究之父》之名广为国内学界所知。可是,霍加特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究竟怎样?即便是在英语世界,这个问题也长期没有得到充分阐述。在《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及《文化转向》一文,英国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代表斯图亚特·霍尔权威地、详细地阐述了霍加特的早期研究工作对文化研究以及英国新左派运动的深远影响,力证:如果没有霍加特的开创性工作,就不会有后来的文化研究。对于20世纪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拉尔夫·密里本德,虽然国内学界比较早就译介了他的几本代表作,但对于其生平及思想发展历程却一向缺乏足够的了解。密里本德的学生兼同事列奥·潘里奇撰写的《作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密里本德》一文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至于汤姆·奈恩,国内学界几乎一无所知。可事实上,他是英国新左派运动史绝对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人物;离开了他与佩里·安德森共同制定的“安德森—奈恩论题”及其所引发的巨大争论,英国新左派的后期发展是根本不能想象的。此外,他还是当代英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主义理论家之一。通过《汤姆·奈恩的民族主义理论:历史发展与当代批判》一文,读者将能够对他的思想特别是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获得一种详尽的全景式了解。

一般来说,雷蒙·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国内学界最为熟悉的三位英国新左派思想家,相关研究文献也比较丰富。有鉴于此,《英国新左派思想家》特别选取了一些具有独特视角的文献以绘读者。例如,雷蒙·威廉斯通常以文学理论家的形象出现在国内读者面前,而该书收录的《雷蒙·威廉斯的新左派政治学》一文则着重突出了他的政治思想及其历史意义。对于爱德华·汤普森这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该书收录的两篇文章都具有与众不同的研究视角。其中,《爱德华·汤普森:作为行动主义者的历史学家》一文以汤普森作为历史学家的社会政治活动为中心,考察了他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参与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爱德华·汤普森的伦理激进主义及其遗产》一文则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系统分析了作为“公共道德家”的汤普森的人生轨迹、思想发展以及他留给当代的宝贵遗产。至于霍布斯鲍姆,国内读者对他的史学思想已经比较熟悉。而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与工人阶级》一文,读者看到的则是霍布斯鲍姆尚不为国人所熟悉的政治之维。

该书收录的其他文献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自由、欲望和革命: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佩里·安德森的早期新左派政治学》为读者了解英国新左派早期的一些重要理论争论提供了详尽的阐述。《斯图亚特·霍尔的学术之路》和《伊格尔顿学术思想概览》分别对霍尔和伊格尔顿的思想发展历程提供了详略得当的叙述,是两篇出色的导论性文献。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

## 马克思思想在意大利的传播与接受——以《共产党宣言》为例

□ [加] 马塞洛·马斯托

由于理论争议和政治原因,国际学界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兴趣曾一度(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低落。然而,呼吁马克思回归的声音却一直没有消失,马克思的文献也总是因各种原因而不断吸引着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如今,人们研究马克思的兴趣又被重新点燃:欧洲、美国乃至日本的图书馆的马克思著作又开始被频繁借阅;世界各国的报纸、期刊、电视和广播节目都不断把马克思称为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思想家;以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主题的杂志、国际会议、大学课程及研讨班不断推出。而《共产党宣言》则得到了全世界读者和评论家们最广泛的关注,它不仅是历史上传播最广的政治小册子,也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权威分析之作。

马克思思想在意大利的传播与影响

正是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过程中,意大利革命组织开始意识到马克思思想的价值。

在意大利,马克思的理论一直享有很高的声望。它不仅影响着意大利的科学和文化领域,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意大利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同时,它也是无数人企图获得自由和解放的主要理论武器。那么,马克思是如何以及何时进入意大利的呢?19世纪60年代末,意大利出现了第一部马克思的译作,涉及的是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演讲。而正是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过程中,意大利革命组织开始意识到马克思思想的价值。于是,仅仅几周内,意大利国内出版界及工人报纸都相继出版和摘录有关马克思的文章和传记。这一时期的意大利不断宣传马克思的思想,以至于马克思变得像上帝

一样万能,也正是在此时,意大利当局开始限制马克思思想的传播,尽管当时传播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甚至难以置信地将马克思的理论同傅立叶、马志尼、巴师夏等人的理论强加到一起等等。可见,此时的意大利并没有真正认识马克思,所以国际工人组织的意大利支持者几乎全都站在巴枯宁一边也就可以理解了。而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马克思思想对于意大利工人运动影响甚微。

到了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意大利出版,此外,在出版界和学术界的努力下,《出版经济》于1882年至1884年分期刊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后又于1886年整理成册。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传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很少有人真正阅读过马克思的原著,而主要参考的是马克思追随者和继承者所提供的二手材料。意大利的研究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构了他们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构建由于缺乏意大利本土社会研究的支撑,而导致了一个软弱的、畸形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一个号称无所不能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但无论如何,粗糙而不规范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最终融入了意大利文化与学术界。

《共产党宣言》在意大利的传播与接受

《共产党宣言》的生命力之旺盛、传播范围之广泛、影响力之深远,是历史上几乎任何文献都无法媲及的。

1875年,在一部题为《德国经济学的社会问题》的著作中,首次出现了有关《共产党宣言》的概



■ 马塞洛·马斯托

述:“从无产阶级的角度来看,这一设想无异于资产阶级的《人权宣言》:它是19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这个世纪的代表,给我们指明了道路。”此后几年,一些杂志和报刊也纷纷发表对《共产党宣言》的评论。尽管这些评论多赞美之词,但意大利人仍期待拥有他们自己语言版的《共产党宣言》。

1885年,社会主义者马尔提涅蒂·帕斯夸勒收到了恩格斯赠予的《共产党宣言》,并完成了对它的翻译,但由于缺乏资金一直未能发表。直到1889年第一部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才得以问世,而此时早已出版了21部德国版本、12部俄国版本、11部法国版本、8部英国版本、4部西班牙版本、3部丹麦版本(第一本出版于1884年)、2部瑞典版本,以及葡萄牙版、捷克版(1882年)、波兰版(1883年)、挪威版(1886年)和犹太版(1889年)。尽管如此,1889年版的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质量非常差,不仅缺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序言,而且第三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以及其他一些部分或被省略或被简要概括。总之它并没有成为真正为意大利人所接受的普及版本。

第二部意大利版《共产党宣言》于1891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现,这部译作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彼得里完成的(所参考的母版是1885年由《社会主义》杂志在巴黎发表的法国版)。但这一版仍缺乏序言并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错误。恩格斯在给马尔提涅蒂的信中表达了他的不满。

第三部意大利版本《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家杂志的增刊诞生于1892年。这部基于1883年德文版翻译过来的版本宣称“自己是意大利第一部且是唯一一部没有背叛原作的版本”。尽管该版本同样存在着一些错误和节选问题,但它明显具有超越其他版本的优势,并在1926年前重印了多次;1893年,它以小册子的形式印发了1000册,并基于德国第五版《共产党宣言》对原文做了一些修改;1896年它又被重印了2000册,内容包括了1872年、1883年及1890年的序言。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为区别于以前的版本,编者还从恩格斯那里得到了一篇由恩格斯撰写的《致意大利读者》。

到了19世纪90年代,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带领下,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在意大利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尽管这并不足以阻止一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不过这种糟糕状况有幸因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出现而得以改变。拉布里奥拉是第一个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带到意大利的人,而他完成这一任务的著作就是《论历史唯物论》(1895—1897),这是意大利第一本“完全以《共产党宣言》为基础”的著述,恩格斯曾经在他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称赞过这本书,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最重要的评论和注解。因为拉布里奥拉的出现,意大利工人运动终于有了自己的理论指导者,因为他既赋予社会主义以科学的尊严,赋予意大利民族文化以新的生机活力,同时又使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与欧洲马克思主义并驾齐驱。然而,尽管他拥有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严谨态度,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所迫,他还是做出了一些理论妥协,这使得他的研究在整个欧洲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不具有明显的代表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埃尔伯·金泰尔在意大利出版了《马克思的哲学》(后来被列宁称为值得重视的一本书),该著作与当时其他一些政论性著述一起共同掀起了一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思潮,在意大利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但与德国不同的是,由于在意大利社会党中不存在“正统”马克思主义潮流,因此思想斗争只是在两党修正主义派别中进行的,它们分别是改良主义、工联主义。这场斗争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20世纪头十年里,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被排除在意大利社会党的日常工作之外,“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被束之高阁了”。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其他地方,资本主义阵营正在欢呼庆祝“马克思主义的解体”。

1922年,法西斯恐怖势力登上意大利舞台,在随后的一年里,《共产党宣言》的所有卷册都被从意大利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清理出去。1924年,马克思所有的出版物和一切与工人运动相关的东西都被列入了黑名单。1926年,意大利进入了现代史上最悲惨的时期。1926年至1943年之间,除了一小部分地下出版物,在意大利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已很少公开流通。但随着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胜利,各种新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接踵来到了意大利。意大利共产党在南部解放区组织的一些小出版社赋予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以新的生命力:解放区的出版社相继在1943年推出了3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在1944年推出了8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这种频繁出版的现象一直持续到1945年甚至更久。

上述历史回顾清楚地表明,意大利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上是十分落后的。但无论如何,它都在意大利人民群众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最终成为他们的重要理论参考。自《共产党宣言》出版后160多年来,马克思的众多追随者和反对者仍各持己见,但无论倾向于何种解释,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生命力之旺盛、传播范围之广泛、影响力之深远,是历史上几乎任何文献都无法媲及的。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哪本书能够永葆青春、与时俱进、源源不断地给人类以新的启迪,无疑只有《共产党宣言》可以做到。

(本文作者籍贯意大利,现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教,主攻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本文译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张秀琴、魏天舒。)